



抓间谍者

——一个老牌特工生涯的自述

军事译文出版社

抓 间 谍 者

〔英〕彼得·赖特 著

林祥铭 郑道根
周爱群 杨岐鸣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SPY CATCHER

—The Candid Autobiography of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er

PETER WRIGHT

New York 1987

抓 间 谍 者

〔英〕彼得·赖特 著
林祥铭 郑道根 译
周爱群 杨岐鸣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 字数360,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9·31 定价: 3.50元

ISBN7-80027-008-4/I 4

出版说明

《抓间谍者》一书是英国反间谍机关军情5局（即安全局）特工人员彼得·赖特的回忆录。因书中披露了许多涉及英国国家利益和声誉的重大内幕，英当局近年来一直坚持禁止该书出版。美国维京企鹅出版公司买过版权，抢先于今年7月将该书出版。本译本即根据美国1987年7月第一版译出。

赖特于1955年加入英国军情5局，成为该局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科学家，后官至副局长，1976年退休。他是该局许多新的侦查技术的主要设计者，并曾亲自领导和参与了若干重大的反间谍案件的侦查行动，特别在追捕苏联潜伏间谍方面颇为卖力并有独到见解。他不顾情报人员“终身保密”的规定，在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重要内情，如：对苏联打入英情报、外交等部门的所谓“五人间谍网”，特别是对其中“第五人”的跟踪追查——经过反复侦查，认为这“第五人”就是当时身为军情5局局长的霍利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线索，怀疑英当时的首相威尔逊是苏联间谍，遂对其实施监视，并欲密谋搞垮其工党政府；对苏联、法国、埃及等国驻伦敦使馆进行窃听和截收其无线电通信，等等。书中除详细叙述了英苏之间的情报与反情报斗争外，也具体谈及英美等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和相互矛盾。

本书对我安全、公安、情报、外交等部门及国际问题研

究机构有较大参考价值。对作者的资产阶级观点及其在论述某些问题上的偏颇之处，请读者自辨。

由于翻译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开 场 白

我有好多年都想象不出离职前的最后一天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在英国安全局即军情 5 局的最高领导层干了 20 年，到了 1976 年 1 月，是我该重返现实世界的时候了。

那一天，我最后一次从尤斯顿路地铁车站走了出来。当我沿着高尔街走向特拉法尔加广场时，冬天的阳光灿烂耀眼。我走了 50 码以后，拐进了一座无名的办公大楼的大门，门上没有任何标志。这个看起来不象是个情报机关的英国反谍报机关的总部就夹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座医院之间。

我向谨慎小心地站在接待室那儿的警察出示了我的出入证，然后乘上了一部特设的电梯，这部电梯是专门搭载高级军官到 7 层楼的核心办公室的。我不声不响地沿着走廊走向我的办公室，它紧挨着处长的套间办公室。

那些办公室都是静悄悄的。我能听到把使用月票的乘客送往西区的地铁火车在地下深处行驶时发出的隆隆声。我打开了我办公室门上的锁。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情报军官所必备的一些用具：一张办公桌和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有防窃听设备，供对外通话时使用。房间的一面有一个绿色的金属保险柜，保险柜的正面安有特大号的暗码锁。我把外衣挂了起来，然后机械地开始安排我的事务。我曾经在鸡尾酒会上见到过许许多多退休军官以打听消息和闲聊来消磨时光，而我却想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我决心给自己安排一种新的生活——到澳大利亚去养马。

我拨动暗码锁上的号码，打开了保险柜的沉重的门。靠门处是一大堆印着“绝密”标记的档案室的案卷，后面则是很整齐的一排小型暗码箱。这些年来我调用过的案卷数以千计，而眼前这些案卷却是最后的一批了。这里面有按惯例传给我阅看的特工人员的例行报告、计算机作业组的最新报告和有关爱尔兰临时共和军实力的最新分析。案卷总是要求有个回答，而我却回答不了。有关俄国外交官的案卷是由一位年轻军官送给我的。我认识他吗？不见得。这是一起双重间谍案件，已经断断续续地处理了好多年了。我拿出过什么主意吗？没有。在你参加这个反间谍机构时，每一个案件看起来都是不同的，而在你离开时，所有案件似乎全都一样。我小心地签退了那些案卷，让秘书把它们送给档案室。

午饭后，我着手处理小暗码箱里的文件。我把那些小箱一个一个地从保险柜的后部拉了出来。第一个小箱里装的是有关窃听器和无线电接收机的技术细节的文件，这是50年代我作为军情5局的第一名科学军官在该局工作时留下来的。我派人把这些文件送给了技术处。一个小时后，处长到我这里表示感谢。他是一位政府雇用的十足的现代派科学家，他衣着整洁，办事谨慎，并且不断地追求金钱。

“那只是我保存的一些零散文件，”我说道，“我想它们对你不会有很大的用处。现在全都靠卫星了，对吗？”

“啊，不，”他回答说，“我会喜欢阅读这些文件的。”他显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和我从来没有真正很好地相处过。我们两个人的经历不同。我过去利用战时物资临时制作胶水、粘合剂和橡皮筋，而他却是一位国防承包商。我们握了一下手，我又开始清理我的保险柜了。

其余的小箱里装的是我在1964年参加反谍处工作后收集

的文件。当时，搜索隐藏在英国情报机关内部的间谍的工作正是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手写的笔记和打字的备忘录里记载的尽是些有关间谍活动到处横行的情况，里面包括嫌疑对象的名单和有关指控、背叛和判决情况的详细材料。这场没完没了的纸上谈兵式的追踪，开始时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但在结束时却是一团迷雾。在这场追踪中可以看出我的职业生涯的端倪。

最后，我的秘书走了进来，交给了我两个蓝色的本子。

“您的日记，”她说道。于是我们一起把本子撕碎，扔进了我办公桌旁边的待烧文件袋里，然后就到了进行最后一项仪式的时候了。

我走到了政府机构办公室。值班军官交给我一个卷宗，里面开列着我现在使用的秘密文件借用证的清单。我便开始签退那些小借条。首先退还的是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的使用证，然后再清退我手上的大量案件文件的借用证。获得秘密是属于个人的事，而失去秘密则是令人厌烦的公事，我签字时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使我离这个秘密世界远了一步。还不到半个小时，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秘密世界就与我永远隔绝了。

接近黄昏时，我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前往军情5局设在梅费尔区莱肯费尔德大厦内的旧总部。这个机构正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楼办公，可是，预定要在那里为我举行欢送会的职工酒吧——“小眼俱乐部”却仍在莱肯费尔德大厦内。

我走进了这座旧楼。楼里的走廊都用柚木镶嵌，办公室的墙上都有装饰嵌线。当年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和布伦特这几个人的追踪工作，就是在这些走廊上和这些办公室里进行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打过军情5局历史上最秘

密的一场战争，当时怀疑在这个反谍机构的内部有一只未被发现的鼯鼠。我们的怀疑对象是军情5局前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但是，我们始终无法证实此一怀疑。霍利斯的朋友们对于这项指控感到十分愤慨。双方在本能、激情和偏见的驱使下，象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一样地争执不下，时间长达10年之久。

在70年代，争执双方的主角们一个一个地退休了。最后，迁往新址办公的举动预示了这场战争的结束。但是，我在莱肯费尔德大厦的走廊上行走时，仍然能够产生关于背叛、追踪和破案的实际感觉。

我的欢送会开得很平静。与会者讲了许多好话。局长迈克尔·汉利爵士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我接受了同事们按惯例送给我的名片，他们在上面写了临别赠言。军情5局善于经营特工人员的洛德·克兰莫里斯在名片上写道，我的离职是“一项重大的、重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是对机关的损失，但是，真正的损失却是我自己的损失。

那天晚上我睡在高尔街办公室的最顶层的单元房间里，偶尔被到达尤斯顿车站的火车的响声所惊醒。次日一早，我穿好衣服，拎起了公文皮包——里面空空如也，这还是第一回——然后，我下楼走到前门，向警察告别后就走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这是一项重大的、重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一切都开始于1949年。那是一个会使你想起严冬的春天的日子。雨点落在埃塞克斯郡大巴多的、用预制构件盖成的实验室的铁皮屋顶上，发出了咚咚的响声。当时，我作为一名海军的科学家，配属于马可尼公司，正在那个实验室工作。一部示波器在我的面前跳动着，真叫人头痛。搁板桌上零乱地摆着一大堆上面潦草地写着计算数字的纸张。要设计一种能从不断翻滚的海浪回波中辨别出潜艇潜望镜的雷达系统，并非易事。我从事这项研究已经好多年了。电话铃响了，那是我的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电话。他是马可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迪·布伦德里特想见我们，”他说道。

这一点也不新鲜。布伦德里特以前曾是皇家海军科学处处长，如今担任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近来他个人一直对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感兴趣。对于究竟是否要为生产一个原型系统提供经费的问题，有必要很快地作出决定。这个项目要花很多钱。战后的防务研究与财政削减之间有着没完没了的矛盾，所以我做好了应付另一场容易令人发火的小冲突的思想准备。

我对有机会直接与布伦德里特交谈表示欢迎。他是与我们一家人都有来往的老朋友。战时我父亲和我都曾在海军部里为他工作过。我猜想，说不定会有机会干一件新的工作。

次日，我们在不停的蒙蒙细雨中驱车前往伦敦。我们把

车子停在布伦德里特在斯托利门的办公室附近。白厅的外表显得灰暗破旧，柱廊和雕像与瞬息多变的世界似乎很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还在作着“要过好日子”的许愿，但是，冬天的生活是艰苦的，人民对于过定量配给制的生活感到坐立不安。1945年胜利时的欢快心情早已被阴郁的不满情绪所取代。

我们向在布伦德里特的外间办公室里的、衣着整洁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在这个附属房间里的人，都以白厅的那种压低声音的方式轻声地说着话。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的。我同几个熟人打了招呼，他们都是来自各军种的实验室的科学家。我猜想，这似乎是一个有很多人参加的例行会议。我从未见过面的两个人离开了人群。

这两个人当中个子较矮的那个人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一定是赖特一家人了。”他说话时带着军人的那种短促但清晰的音调。“我是陆军部的马尔科姆·卡明上校，这位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另一个陌生人走过来了。“这位是约翰·亨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位朋友。”卡明使用了白厅用来辨别其秘密公务人员的那种古怪的代号。我猜想，不论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它不大可能讨论反潜战问题。有军情5局和军情6局的一些人参加的会议，是不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布伦德里特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请我们进去。

正如他的名气很大一样，他的办公室也很大。室内有巨大的吊窗和高高的天花板，这使他的办公桌显得太小了。他把我们引到会议桌那里，桌上很小心地摆着吸墨器和细颈水瓶。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精力充沛。他就是当年精心挑选出来的那批人中的一个，那批人当中还有林德曼、蒂泽尔和科克罗夫特等人，他们负责的工作，曾经在技术和科学方面

满足了英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他先是担任海军部科学研究处处长助理，以后担任皇家海军科学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在战争期间招募科学家参加政府机构的工作。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并不特别有才华，但是，他了解科学家所能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方针是，只要有可能就提拔年轻人。由于各军种的首脑信任他，他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力，使这些年轻人发挥最高的水平。

在40年代后期，当精疲力竭、国力衰微的英国准备打一场新的战争——冷战时，布伦德里特便成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被选中就如何再一次最有效地发挥科学界的作用问题出谋献策。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科学副顾问，后于1954年接替约翰·科克罗夫特爵士担任科学顾问和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

“诸位，”在我们就座后布伦德里特开始讲话了。“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们现在正在作战，从去年在柏林发生那些事件以来，我们就已在作战。”

布伦德里特明确表示，俄国对柏林的封锁和随后西方的空运，对国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至少在短期之内，不是要用士兵而是要用间谍来打这场战争，”他接着说，“我一直在同安全局局长珀西·西利托爵士讨论我们的处境。坦白地说，他断定，‘情况不妙。’”

布伦德里特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特工人员要在铁幕后面顺利地开展经营活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可是关于苏联及其盟国的意图的情报，却非常缺乏，所以需要在技术和科学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以填补这个空白。

“我已经同你们当中的几位，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和军

情6局的代表彼得·狄克逊，概略地讨论过了这个问题。我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以便对各种选择方案作出评价并立即开始工作。我还向珀西爵士建议，物色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在研究方面帮助工作。我想提出彼得·赖特这个名字，也许你们有的人认识他。目前他配属于三军电子研究实验室，他将兼职做我们的工作直到我们知道需要做的工作量有多大。”

布伦德里特把眼睛转过来盯着我。“彼得，你将为我们将做这件工作，对吗？”

在我还来不及作出回答时，他就转向我的父亲。“我们显然需要得到G·M·马可尼的帮助，所以我也吸收你参加这个委员会。”（过去人们通称马可尼为G·M·，在海军中人们也这么称呼我的父亲。）

这就是布伦德里特的典型作风，发出邀请时好象在下达命令，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使白厅这部机器完全变形了。

我们把那个下午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讨论各种想法。军情5局和军情6局的与会者默不作声，这一点很引人注目。我猜想，这是秘密公务人员在外人面前自然采取的一种沉默态度。每一位科学家都即席扼要地介绍了各自实验室中可能具有情报应用价值的各项研究工作。对情报机构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技术研究，是要花许多时间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即情报机构急需那种不必派人进入房屋就能进行窃听的新技术。苏联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除了通过界墙或者改建使馆，进入房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到了吃下午茶点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出了20个可能会取得研究成果的领域。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价文件，随即散会。

我正要离开时，邮局技术处的一个叫约翰·泰勒的人对我作了自我介绍。刚才在会上他相当详尽地谈到了邮局在监

听装置方面的工作情况。当我们交换电话号码时，他说：“我们将在一起进行这项研究。下星期我和你联系。”

在开车返回大巴多的途中，父亲和我兴奋地谈论着这次会议。这件事是如此不可预测，在战时白厅常有这种事，而在战后就很少见了。我感到激动是因为有机会摆脱反潜研究工作，他感到激动则是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家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秘密情报工作又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二)

我的父亲于191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马可尼公司，作为工程师开始研究一种探测无线电信号的改进方法。他同H·J·朗德上尉一起研制成了一种真空接收机，这种接收机第一次使得截获远程通信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两天，他正在切姆斯福德市霍尔街马可尼公司的老实验室里研究这种接收机。此时，他知道他正在接收德国海军的信号。他带着第一批接收机去马可尼公司的工厂经理安德鲁·格雷那里。格雷是海军情报局局长雷吉·霍尔上校的私人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机构中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海军部的那间有名的第40号房间内负责破译德军的密码。他作出安排，让我父亲乘一辆专门包租的机车去利物浦街车站。他在研究了材料以后坚持要马可尼公司放走我的父亲，让他去为海军建立侦听测向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机构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能够及时地发现德国公海舰队入海，以便驻在斯卡帕湾的英国舰队能对其进行截击。海军情报机构知道，德国舰队通信静止时，就说明它停泊在基尔运河的东端。霍尔认为，当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开进北海时，侦听德军总司令在旗舰上发出的无线电通信是有可能的。

我的父亲着手设计具有足够敏感度的设备，终于研制了“非周期性”测向仪。使用它就能从大量的其它干扰信号中

精确地辨别出所寻找的信号的方向。该设备经过了几年时间才用于实战，但是，它终于成为反潜战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即使在现在，所有测向设备都是“非周期性”的。

在这个系统还不能完全用于实战的时候，我的父亲于1915年向霍尔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即现在的奥斯陆）设置一部测向仪。那时候挪威是中立的，但是，因为担心惊动德国人而不能利用英国驻那里的使馆，所以霍尔问我父亲是否愿意到那里去，为军情6局秘密操纵测向台。在几天之后，我父亲伪装成做农药生意的旅行推销员出发前往挪威。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一条小巷里的一家小旅馆开张营业，并且租了一个顶楼房间，房间的位置非常高，这样便可以安装测向无线电收发报机而又不惹人注意。

军情6局设在使馆内的工作站向他提供了通信设备和零件，但是，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他的这套无线电设备最终肯定会使他暴露的。他不属于外交工作人员，一旦被发现使馆可以不认帐。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战争结束以前他将被监禁。在最坏的情况下，他要冒引起德国情报机构注意的风险。

他顺利地进行了6个月的活动，向海军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预警。后来，在一天早上，他走下楼，在他常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坐下来吃早饭。他无意间抬头看到马路对过的墙上贴着一张新的招帖。那是一张悬赏招帖，上面有他的照片，招帖上说谁能提供情况最后把他抓住，便可领赏。

他在开始活动之前，就已同军情6局研究过脱险路线。他迅速地吃完早饭，回到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设备装进了

盒子，推到了床底下。他把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分证收拢在一起，并且留下了大量现金，希望这可能促使旅馆老板把他的情况忘掉。

挪威当局可能设想，他最可能使用的脱险路线是走向向瑞典海岸的这条路。然而，我父亲没有走这条路，而是朝西南方向出发。他沿海岸走了10英里以后，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走到他面前问他是谁。我父亲证实了自己的身分，便被带上一艘汽艇，再摆渡到在海面等待的一艘英国驱逐舰。

多年以后在我快要退休时，我设法去了解军情6局的档案中有关这次活动的细节。经当时任军情6局局长的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爵士的安排，我在他们的档案室花了一天时间去找文件，但是，我一无所获。军情6局的文件清理人按惯例把多年以前的所有记录都销毁了。

我于1916年诞生在切斯特菲尔德市我祖母的房子里。当时由于我父亲在挪威为军情6局工作，我母亲就住到祖母那里去了。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德国的策佩林式飞艇对附近的设菲尔德市进行了空袭。我是提前好多日子出生的早产儿。由于受到战争的压力，医院里找不到床位。但是，我母亲靠着用玻璃药瓶和热水袋做成的简易保育箱保住了我的性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父亲又进了马可尼公司。他成了马可尼本人的一个被保护者，并被任命为研究部主任。我们搬进了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座大房子，但是，我们只住了几个月，又搬到了切姆斯福德市郊的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往往象是一座已废弃的无线电厂。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和装有电路图的铁皮箱。我父亲是一个热情认真、好动感情、有点性急的人，他更象是一个艺术